

张则孙
著

A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full beard and mustache, wearing a light-colored shirt.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dark red color. The lighting is soft, highlighting the man's face and beard.

民主斗士 李公朴

民主斗士李公朴

张 则 孙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斗士李公朴/张则孙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ISBN 7-5073-1159-7

I. 民… II. 张… III. 李公朴 (1902~1946) —生平
事迹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999 号

民主斗士李公朴

著 者/张则孙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李书英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850×1168mm 32 开 10.5 印张 254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073-1159-7/K · 558 定价: 2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我所认识的李公朴

（序 言）

周 巍 峙

我是在1932年冬，经过戈公振、邹韬奋先生的介绍，开始帮助李公朴先生工作的。

那时，李公朴刚从南京来到上海。在左翼文化的影响下，他站在时代的高度，深深感到社会上的广大青年，亟需加强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救亡图存，国家富强，个人才有前途。他说，他做过学徒，对职业青年的渴望求知欲和失学的痛苦有切身的体会；他也做过学生，懂得被关在学校死读书的学生，在走向社会时学非所用的痛苦。他把时代的需要和广大青年的迫切要求结合起来，说服《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并且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设立了读书指导部，由地下党员艾思奇、柳湜、夏征农等同志负责，在《申报》上开辟了一个“读书问答”栏，有计划地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

那时，为了筹备图书馆及业余补习学校，我帮李先生做收集有关资料、拟写章程等工作，后来正式当李先生的秘书。我每天到李先生家上班，日常工作就是剪报、收集整理图书资料、做联络工作，主要是代李先生给青年复信，整理讲话稿，有时还将复信整理成文稿发表在“读书问答”栏中。所以我的工作实际上是围绕着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进行的，特别是围绕着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栏进行的。

我从日常工作中，体会到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栏的建

2 民主斗士李公朴

立，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创举。这不仅因为它通过解答读者的问题，联系实际地进行了进步思想的教育，引导大家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加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从许多来信中可以看到由于“读书问答”栏抓住了青年追求真理、学习向上的要求，确实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有着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

这当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他们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企图把“读书问答”连根斩掉。但是李公朴和艾思奇、柳湜、夏征农等却从另一个角度对“读书问答”栏也感到不满足，因为它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抗日救亡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所以他们决定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李公朴主编，艾思奇、柳湜编辑，我也参加协助做了一些工作。《读书生活》从1934年11月创刊，发表了大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文章，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进行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俗化的尝试，传播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这个刊物和《大众生活》等许多进步刊物一起，对青年的思想启蒙起着巨大的作用，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6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原由李先生当社长。李先生和其他救国会领导人被捕后，由地下党员黄洛峰同志负责，编辑仍由艾思奇等同志担任，我也投入了这一工作。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发行不久，便被查禁。后经过一些修改，又改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印了30多版，成为风行全国的一本青年的哲学启蒙书。读书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进步的通俗读物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读物，直至经典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读书生活出版社和当时先后建立的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新知书店等在上海形成了有力的进步文化阵地。

由于国难深重、形势的发展和广大青年觉悟的提高，业余补习学校在进行教学活动的同时，还在学生中组织了不少进步团体，如“读书会”、“歌咏队”等等，广泛开展了救亡宣传活动。后来在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就有大量《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的学生和流通图书馆的读者参加。他们还组织了三个群众歌咏队，一个新生合唱队和一个口琴队，在上海的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李公朴知道我喜欢音乐，有时在家里朋友们聚会时就让我为大家唱一曲，或者用口琴奏一曲。他经常鼓励我发挥在音乐方面的才能。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前夕，李公朴因骑马摔伤了手臂，住进了医院，并仍在医院坚持工作。我常去陪他住院，协助他处理一些工作。我们谈起群众迫切需要革命歌曲，李公朴鼓励我说：“我赞成你好好收集材料，编辑一本救亡歌曲集，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让全国大众都怒吼起来，这对于推动救亡运动，有多大意义啊！”在他和地下党员孙师毅同志的支持下，我就大力收集所有反映现实、唤起民众、有抗日救亡意义，受到群众欢迎的歌曲，编辑了《中国呼声集》，李先生代写了序言。1936年7月初版1.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10月，又再版增订本1.5万册，也一扫而光。这个歌曲集的出版，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就被禁止查抄。后又改为《民族呼声集》，仍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秘密发行。

1935年，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妥协投降政策，国难日亟。5月，日本借口《新生周刊》发表的《闲话皇帝》一文“侮辱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查封了《新生周刊》，逮捕了杜重远，并于6月10日颁布了《邦交敦睦令》，借口“对于友邦，务敦睦谊”，规定对友邦（所谓“友邦”实即不

4 民主斗士李公朴

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不得有排斥及挑衅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卑躬屈膝，对内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已经到了多么无耻的地步！李公朴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气得肝胆俱裂！那天，我见他脸色铁青，在书房里直转圈子，嘴里骂着“太卑鄙无耻了”，还说：“一定要抗议！”他和文化界的朋友们商量，决定在开庭时大闹法庭，公开进行抗议。7月9日，法院审理那天，我带着传单，与李公朴和张曼筠一起到了法庭，庭长怕闹事，谎称延期开庭，待李公朴等离开时，又临时宣布开庭。但李公朴早已料到这一着，临开庭时，又及时赶回法庭。当法庭宣判杜重远违犯“敦睦邦交”罪，判处14个月监禁，不得保释时，杜重远大呼：“中国人不做亡国奴！”李公朴和我也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立时，抗议的口号声响彻法庭内外！抗议的传单满天飞舞！镇压群众抗日运动的审判，成了激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的导火索，成了在法庭上的一次抗日集会，震动了整个上海！

1936年2月7日，日商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被日本监工毒打致死。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纪念梅世钧大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广大工人、学生、爱国同胞更是群情悲愤，准备抬棺游行抗议。有一天，李公朴对我说，听说工人、学生和梅世钧的家属要在明天抬棺游行。已经得到消息，日方准备武装镇压游行队伍。为避免无谓牺牲，救国会决定：马上告知大康纱厂工人停止抬棺游行，并带去100元，转交梅世钧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你去办这件事，这是一个紧急的秘密使命，必须按时完成。为此，李公朴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他告诉我，将同时派两个人（其中一人是量才图书馆的工友朱长太，后来在苏北抗战中牺牲了）先后观察我的行动，如遭敌人伤害或被捕，马上回来报告。当我赶到大康纱厂时，纱厂已全部被日军严密封锁，厂前不准行

人通过，只能走对面的街道，厂里的工人只许出，不许进。我又不知道梅世钧家的住址，没法把信送到梅家，但如不及时送到，就会出大问题。在十分为难的情况下，我急中生智，找到一位刚出厂的老工人，打听梅家地址。老工人不说，问我有什么事。我看他机警可靠，就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请他立即将信和钱转交梅世钧家属，我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我照常去李公朴家上班，才知道李先生已在凌晨被捕。李夫人很紧张地告诉我：有一封中华苏维埃政府毛泽东主席写给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及全体救国会会员的信还存在家里，没被搜去。公朴说，跟你商量一下，看怎么办。我一想，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保护救国会领导人，就把这封信带回，藏在自己家里。父亲一直把这封信藏在身上，整天在马路上转，以防国民党来家查抄。

1937年8月初，上海戏剧界正在南市蓬莱大戏院公演话剧《保卫卢沟桥》，忽然，李公朴出现在剧场里。他是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特意来看望大家的。他当场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剧场里，群情鼎沸，掌声、歌声、口号声不断，出现了感人的高潮。我正穿着从部队借来的长满了虱子的军衣，扮演着二十九军战士，也和观众一起热烈欢迎这位救国会领袖。

李公朴出狱后不久，就决定同柳湜、桂涛声和我一起去华北前线做抗战宣传和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我内心感到他实际上是要和共产党、八路军直接联系，于是决定随同李先生奔赴山西前线。8月下旬，我们赶到大同前线，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队伍已经纷纷溃退。我们只好回到太原。

在太原，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李公朴参加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任委员和宣传部长。

同时，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李公朴与桂涛声、柳湜、我

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彭雪枫一起商量，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创立“全民通讯社”，由李公朴担任社长，日常工作由八路军办事处领导。李先生在结束工作回南方前曾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我表示愿意留在太原参加“全民通讯社”的工作。后来我参加了八路军办事处及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1937年底和1938年4月，我在山西临汾和陕西西安先后见到李先生，他仍是那么风尘仆仆，为抗战教育及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四处奔波，一直到1939年李先生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时，他还专门找到西战团的驻地来看我，我们才又见了面。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李公朴的一生是极其短暂的一生。他仅仅活了44岁，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他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却经历了整整一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斗争的决胜的时代，经历了一个中国人民备受欺辱、历尽黑暗，而又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力争光明的时代。李公朴先生走过的道路，是千百万革命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的、但又有他个人特点的道路。他为了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受到了多少挫折、磨难、打击、误解和迫害，经受了多少次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才悟出了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才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获得解放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其他任何别的道路，都是“此路不通”。这是历史的结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必然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者，这就是李公朴的道路，也是千万中国革命知识分子走过的必由之路。

李公朴曾经向往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富强，但他在美国经过调查和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他也会寄希望于国民党。那么，走国民党的道路吗？李公朴

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得出了答案：“不！”在南京这个国民党官僚统治中心的两年，使李公朴彻底地厌恶和痛恨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糜烂，他下定决心：“誓不为官”。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使他认识到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妥协投降的实质。到了上海，在左翼文化的影响下，他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开始接近了一些共产党人。他的事业每前进一步，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钳制、打击和迫害。所有这些，都使他不断地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不断地接近共产党，不断地接受共产党的影响。日本侵略军长驱南下，国亡无日的惨祸已经迫在眉睫。他急谋抗日救亡之道，首先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既不是国民党员、又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恰恰有利于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因此，他把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看成是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

李公朴先生的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性格爽朗，敢于直言，胸襟坦荡，热情待人。他既深入基层，又能联系上层，广交朋友，不但有些巨商富贾，就是国民党党、政、军的上层和地方实力派的有些人物也与他有来往，如：阎锡山、卫立煌、孙连仲、李默庵、邓宝珊、杨虎、潘公展等，有些人因此认为他社会关系复杂，甚至引起一些朋友的怀疑、误解和非议。但是，我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社会关系复杂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历史和工作等各个方面的客观条件所形成的。关键在于，只要他是非分明，立场坚定，反而可以利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行许多有利于抗日救国、有利于革命的工作。“七君子之狱”期间，国民党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他毫无动摇；在法庭上，他严辞批驳，把审判者逼到了被审判席。为了保护工人利益，他不畏权贵，坚决斗争，因而被陈诚羁绊，第二次入狱。蒋介石威逼他去重庆做官，他丝

毫不为所动，敢于对蒋介石说“不”。为了营救被捕青年，我在他家工作时，就曾在三楼书房里，亲眼见他 and 一位朋友商量如何通过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营救一位被捕青年；亲耳听到他给潘公展打电话保释一位被捕青年。他的态度是那么热诚，那么认真。

这证明了李公朴先生的原则立场是始终不变的，也证明了他所说的：“历史是不会静止的，是永远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紧跟中国共产党；出狱后，首先就到山西前线，实质上是去找共产党，接着，又奔赴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并且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穿越封锁线，到了敌后，把他的亲身经历、亲目所睹撰写成书——《华北敌后——晋察冀》，客观公正地宣传共产党、八路军。1946年，重庆教场口事件时，他流了血。但是压迫愈甚，其志弥坚。为了救国，为了民主，为了团结，高官厚禄利诱不了他；拘押、监狱、毒打吓不倒他。流血牺牲，他早有思想准备，他在悼念黑茶山遇难的四烈士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的悼诗——《你们的死叫我格外不怕死》里，一口气就说了12个“死”字。真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不悔”。他早就下定了为民主运动献身的决心。他不断地改造自己，和共产党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他更明显地认识到了为了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为了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不参加进步政党”的思想，是值得考虑的。1941年1月，他喊出了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万岁！”的口号，并且在1946年7月，他牺牲的前夕，向地下党同志提出希望共产党理解他。最后，是国民党刽子手暗杀了他，而共产党也更理解了他。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唁电，对李先生作出了最后的评价：“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

之光荣。”

张则孙同志是李公朴先生的姨侄。我们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李先生家的三楼书房里认识的。那时，他年纪虽小，只是高中学生，但已参加了上海中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从事革命工作。我们在救亡运动中相互配合进行斗争，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心战友。十年浩劫中，他曾表示希望能写一部《李公朴传》，我是积极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

2002年11月26日是李公朴先生100周年诞辰。《民主斗士李公朴》是张则孙根据自己和李公朴长期相处的亲身经历，在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这本书实事求是地准确地反映了李公朴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烈士的全过程。我希望《民主斗士李公朴》的出版，将能有助于进一步激励人们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指引下，继承先烈的光荣传统，实践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力推进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张则孙，1920年生，过继外祖父。1928年姨母张曼筠和李公朴结婚后，即在李公朴抚养下长大。1935年在上海麦伦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中共上海文委领导的抗日救国青年团、上海中学联和全国学联的工作。1936年8月加入共青团。1938年随李公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高级班学习后，调中央青委工作。到太行敌后，任一二九师宣传队副队长。1940年后，先后任太岳区青年救国总会宣传部长、区党委教育科长，晋冀鲁豫军区翻译、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科长。1949年后，历任大众日报社采通部部长，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文教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工人日报社代理第一副总编辑，湖北宜昌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交通部宣传部部长，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党委书记等职，并任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

目 录

我所认识的李公朴（序言）	周巍峙（1）
第一章 在时代激流中经受锻炼（1902年至1927年）	（1）
学徒出身 刻苦好学	（1）
爱国家 要民主	（3）
投入革命洪流 参加北伐战争	（5）
第二章 负笈海外 忧思祖国（1928年至1930年）	（9）
结婚	（9）
初到美国	（11）
阿拉斯加工读度假	（15）
启人深思的问题	（17）
在追求探索中返回祖国	（21）
第三章 “我热爱社会教育，我不要做官”	
（1931年至1935年）	（25）
东方和西方的结合	（25）
誓不为官	（27）
“一·二八”抗战——“中国人民未完成的杰作”	（29）
把握时代脉搏 把握青年要求	（32）
图书馆的创举	（34）
《读书生活》和“读书生活出版社”	（36）
普及进步文化的突击队	（40）
第四章 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	

2 民主斗士李公朴

(1935 年至 1936 年 11 月)	(46)
祖国危急 华北危急	(46)
于无声处听惊雷	(50)
“一二·九运动万岁!”	(57)
上海各届救国联合会成立	(60)
对国民党中央宣部《告国人书》的《辩正》和 《态度》	(64)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68)
全国救亡大联合	(72)
吴铁城的“鸿门宴”和蒋介石的南京面谈	(74)
善于利用社会关系,热心办事,热情助人	(76)
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而斗争	(78)
最大的行列 最后的敬礼	(79)
纪念中山先生诞辰和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	(81)
第五章 为“救国无罪”而斗争——“七君子”之狱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	(83)
“七君子”之狱是谁制造的?	(83)
“莫须有”的逮捕、受审和“移提”	(85)
抗议 声援 营救	(89)
在江苏高等法院苏州看守所	(93)
“六个人是一个人!”	(96)
西安事变期间监狱内外的斗争	(98)
“我们没有罪,用不着悔”	(100)
把审判者送到了被审判者席上	(104)
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	(112)
在炮火声和欢呼声中走出监狱	(115)
救国无罪——历史的判决	(118)

第六章 呼吁动员民众 推行抗战教育

(1937年8月至1938年7月)	(120)
到抗日前线去!	(120)
山西——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	(124)
从上海、南京到武汉	(128)
创建民族革命大学	(130)
抗战教育和“民大”	(139)
“保护工人无罪”	(149)

第七章 延安和晋西南之行

(1938年8月至1939年5月)	(155)
到延安去	(155)
“毛主席来了!”	(159)
《革命的摇篮——延安》	(163)
“春在前线!”	(168)
“俯首甘为孺子牛”	(172)
对阎锡山认识的发展变化	(173)

第八章 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

(1939年5月至1940年11月)	(176)
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西北	(176)
在苛岚	(179)
冲过同蒲路封锁线	(181)
在反“扫荡”战争中	(183)
在晋察冀的足迹	(187)
晋察冀——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191)
在晋冀豫区	(199)
“统一战线正需要我这样的人”	(203)

第九章 坚持团结抗战，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4 民主斗士李公朴

(1940年11月至1945年8月)	(205)
从重庆到昆明.....	(205)
青“老”年的知心人 反动派的眼中钉.....	(208)
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	(213)
在杜聿明的宴会上公开批评蒋介石.....	(219)
“准备接受时代洪炉的考验”	(220)
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225)
对“蒋委员长”说“不”	(227)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229)
周恩来同志的评价.....	(231)
第十章 “为民主和平，为老百姓的事业干到底，干到死！”	
(1956年8月至1946年5月)	(234)
“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	(234)
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救国会的改组.....	(238)
昆明“一二·一”惨案.....	(244)
“沧白堂事件”	(248)
较场口事件.....	(250)
“《新华日报》万岁！”	(255)
社会大学与民主教育.....	(258)
社会大学的创建和被扼杀.....	(262)
“为民主和平，为老百姓的事业干到底，干到死”的 历程实录	(265)
第十一章 “我前脚跨出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1946年5月至7月)	(272)
“看你国民党反动派能打几天内战”	(272)
在恐怖气氛下的民盟招待会.....	(274)
宁可倒下，也不屈服！	(278)